

“饭圈”乱象及其意识形态批判

■ 毛奕峰 王 岩

(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江苏 南京 211106)

【摘要】“饭圈”是当代青年追星的主要场域,然而,近几年来却乱象频出,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饭圈”乱象与部分青年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资本增殖的天性与演绎、技术异化的存续与变迁以及西方谋求霸权的延续与拓展密不可分。“饭圈”乱象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泛娱乐风气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狂热式追星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封闭型群组阻滞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性、匿名化交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性、多维度渗透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治理“饭圈”乱象,应坚守正确导向,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话语权;坚持人民至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亲和力;讲好“大思政课”,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影响力;凝聚各方力量,打造协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良队伍;增强制度供给,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关键词】“饭圈” “饭圈文化” 青年 意识形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2.05.009

作为全球化背景下互联网圈群文化的典型代表,“饭圈文化”以多元形式抬头、存续、演化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在“饭圈”里,大量青年因明星艺人而类聚,因立场不同而群分,创造富有自我特色的话语体系,宣扬备受自我推崇的“饭圈文化”。近年来,“饭圈”因其日益频繁的活动、日渐突出的问题引起持续关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当其时,立足于国家与世界的深刻变革,观察体悟“饭圈”乱象,把握切准其出现的根本原因,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引导匡正青年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对于强健个人之思、凝聚国家之心、锤炼民族之魂意义深远。

一、“饭圈”乱象的成因与本质

理性的追星活动本无可厚非,但当其危害个人身心发展与社会安定之时,就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从表面上看,“饭圈”乱象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是部分“饭圈”青年不理性活动的结果,但

收稿日期:2022-07-03

作者简介:毛奕峰,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思潮;

王 岩,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课题编号:19JZD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更为深刻的因素是背后资本借助技术的粉墨登场与疯狂演绎。此外,也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多重侵袭密不可分。

(一)内在驱动:“饭圈”乱象是部分青年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

青年对外界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容易接受新事物,这为其快速适应明星艺人“井喷式”增长的时代提供了可能。另外,生活节奏的加快、学习压力的与日俱增以及独生子女的普遍化等社会变化,使部分青年面临许多心理上的困惑与烦恼,迫切地需要抒发情绪、排遣孤独、彰显个性、获得认同。“饭圈”凭借人群集中、丰富多彩、富有个性、虚实结合等特质,展现出一定的娱乐与放松作用。不少青年加入“饭圈”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在于借追星活动来获得心理的慰藉,不过这种心灵慰藉的很大程度上源于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将物质与精神的享乐作为至高追求,突出表现为趋乐避苦、趋利避害。以古希腊“快乐主义”“幸福论”等观念为起点,享乐主义在爱尔维修、费尔巴哈、边沁等人的接续论述下,由伦理价值变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享乐主义尽管遭受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打压,但文艺复兴的到来则又让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欲求再次得到释放。而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让享乐主义以穷奢极欲的经济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最终培育出西方社会“垮掉的一代”。如今,享乐主义在物质与精神极大丰富的大环境下与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勾连更为紧密,且与先进的技术耦合发展为技术享乐主义,加剧部分青年对追星活动的心理依赖。

不仅如此,盛行于“饭圈”的极强的“划一型”文化与“付出型”心理,使部分“饭圈”青年不仅接受资本这一“他者”的剥削,也乐此不疲地“自我剥削”。“饭圈”注重绩效,其绩效集中体现于明星艺人的发展上。社会的进步带来人们自我意识的空前提高,使人们更愿意听到恭敬而非命令的话语、参与自愿而非强制的活动。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一些平台、企业也多以倡议性的话语、低姿态的举动来鼓动“粉丝”竭尽全力奉献所有来为其实现针对性的目标。这种无休止的“洗脑”,让部分“饭圈”青年萌生“我能够”“我可以”等使其付出更多的心理暗示,并使其与周围“粉丝”的贡献量与贡献率进行对比,将一种强迫性的付出隐藏在虚假的个人自由之下,最终加速资本对这些青年的束缚,使之乐此不疲地“自我剥削”。

(二)资本逻辑:“饭圈”乱象是资本增殖的天性与演绎

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产阶级在挥动技术“魔杖”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同时,也使资本这一“恶魔”降临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成为其“历史的载体和‘包裹’”^[1],构成社会财富的基本元素。马克思指出,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2]。由于商品与利益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关系,资本家对商品“俯首称臣”,用尽一切办法加速资本的运作,商品也因此具有某种主宰资本家命运的神秘力量,进而形成“拜物教”。

21世纪以来,市场与技术的珠联璧合让“拜物教”更为全面地渗透进娱乐产业。一方面,资本的介入产生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宏大“饭圈文化”与文化产业格局;另一方面,这种“饭圈文化”却呈现出衰颓、异化的迹象,愈益成为众矢之的。在明星艺人的使用、代言与宣传之下,在新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种对物的狂热充斥于“饭圈”。新媒体时代,一些资本方为吸引更多青年参与“饭圈”活动,大力打造各类头条网站、视频网站等虚拟平台,使其成为潜在消费者。通常情况下,这种潜在的消费者越多,他们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从而,流量成为资本在信息化时代疯狂追逐的对象,形成“流量拜物教”,加剧“粉丝经济”的“氪金”现象。

在“流量拜物教”流行的背景下,“饭圈文化”多以消费文化的面目示人。流量,作为资本在“饭圈”的代理人,增添了明星艺人的商业价值,从形式、感官与精神等诸多方面控制着“饭圈”青年的情感投入与资金付出,形成流量作为明星艺人价值硬指标的幻象。稍加细究,“粉丝”在

“流量拜物教”中已不再是传统经济活动的消费终端,而是在作为消费者的同时具备着可以为资本创造更多需求的革命性生产力量。“饭圈”为明星艺人圈粉、打投与曝光的过程,实则是资本利用其拓宽资源、广开言路的表现,目的在于催产更多的消费需求。进而言之,“流量拜物教”是“粉丝”将自己的梦想与金钱等倾注于明星艺人,借明星艺人的成功来获取自我满足乃至自我实现,而背后的资本力量成为最大赢家的观念表达,是“拜物教”的当代演化形态之一。在整个过程中,资本从台前走向幕后。初始阶段,资本努力搭建“饭圈”的基本框架与文化架构,当特定的“饭圈文化”成型后,资本便退隐幕后,借助“粉丝”的力量让“饭圈”自我运行。其要做的,主要是保持明星艺人的商品化、关注“饭圈”的发展动向、掌控决定性的市场信息、扩大文化的商业市场、创新获利的经营模式。随着市场的拓宽与资本的美化,消费的本质被“发电”“助威”等词不断遮蔽,部分“饭圈”青年追求更多的不是“饭圈文化”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由此引发“资本过热”。这也在无形中传递给部分青年一种“金钱万能”的错误价值观,酿成不少追星悲剧。

(三)技术要素:“饭圈”乱象是技术异化的存续与变迁

回望人类社会历史,技术的发展与变革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似乎总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发展困境,出现技术异化。马克思承认技术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3],也意识到技术作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而同劳动对立的社会事实,揭示了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换言之,技术异化的实质是资本通过技术奴役人与支配人。

应当指出,技术异化也是资本本质具体外露的一种形式。启蒙运动后,社会思想空前解放,神性之光变得黯淡无力,哲学家们开始对压抑人性的基督教进行猛烈批判。尼采看到时人价值信仰的坍塌,发出“上帝死了”的呐喊,引导人们从极端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中解放出来。历史与实践表明,某一种信仰的坍塌往往伴生着另一种信仰的搭建。面对“上帝之死”,尼采高呼:“超人万岁。”^[4]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以“超人”替代“上帝”的地位,将其视为人的最高目标。如果说“上帝之死”是神走向人的过程,那“超人”就是人走向神的过程,不过后者之神并非指之前的上帝,而是一种权力意志的象征。固然,尼采的“超人”思想对人的自由与理性的重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思想实则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上,维护的是强势群体的自由。尼采的这种“超人”思想使摆脱上帝奴役的人转而落入了资本的股掌。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本家追崇资本强权与政治霸权的历史渊源。伴随世界市场的扩大与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技术异化使某些资本力量以更为隐秘地、冠冕堂皇的“形式正义”进行全方位剥削。

新媒体时代,技术异化集中体现在对互联网与手机应用的使用上。互联网与手机应用的革新,拓宽了青年收看节目的渠道,便利并变革了追星的方式。与传统明星艺人的培养方式不同,当代青年在追星中不再仅仅表现为投票的作用。《偶像练习生》与《创造101》等新型选秀节目以“沉浸式”的偶像养成方式,让“粉丝”来决定选手的去留,使其从旁观者变为深度参与者,赋予其极大的话语权。一些资本方在看到追星模式的改变与“饭圈”能为其带来巨大收益时,利益的驱使让其背离了道德与伦理、公平与正义等人类的终极关怀,反而以先进的技术将有利于自身收益的信息定向传递给特定人群,加剧这种现象的吸金力度。所谓的为明星艺人“助力”“发电”等平台,实际上也不过是其借技术向青年兜售作为“符号”的明星艺人以攫取暴利的途径而已。

(四)政治博弈:“饭圈”乱象是西方谋求霸权的延续与拓展

自资产阶级凭借新技术、新航路等开拓世界市场以来,“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由此,以相对独立为特色的地域性交往形式渐渐被以开放性为特色的世界性交

往形式所取代,修长的民族历史在宽广的世界历史下也具有了更为立体的形态。苏东剧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早期积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推行西方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价值观念等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影响,进而实现其支配全球的野心。纵然国际力量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但其谋求霸权的目的并未改变。通过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来输出本国价值观以侵蚀他国,成为其在当代的惯用手段。

历史上,美国曾选取日本为其文化霸权战略的实施对象。针对日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负隅顽抗,美国开始辅以极具“阴柔”气息的娱乐文化来削弱日本的阳刚之气,乃至彻底瓦解其内在的血性与革命性,从而使其在精神上仰望美国、在文化上弱于美国、在政治与经济上依附美国。在美国的资助下,日本的杰尼斯事务所成为其“娘炮文化”的代理人,用仅仅一代人左右的时间成功使不少日本民众的审美观发生悄然转变。而后,这种“娘炮文化”传入韩国,亦成功掀起一阵“阴柔风”,打造出在培养与“人设”上都经过包装的明星艺人“标准化生产模式”。随着全球化的加快,“娘炮文化”在中国文化市场上激起阵阵“日流”“韩流”,不少男性青年开始在日韩文化的影响下变得女性化。直到我国出台相关治理措施,这一不良文化的输入力度与社会影响才受到一定制约。时至今日,“娘炮文化”与日韩明星艺人的生产模式依旧可以从“饭圈”中找到其魅惑身影。在部分青年眼中,血性、雄性气质与当代文明生活格格不入,他们追求所谓的“精致生活”,认为男性应当成为优雅静谧的“美男子”。在欧美积极塑造硬汉形象、荧屏被极富男性特征的超人、蝙蝠侠、美国队长等霸占的时候,一些东亚国家却涌现出大批“小鲜肉”与“小奶狗”,荧屏多的是青春歌舞与恋爱言情。

“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6]。自步入新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更为多样的形式来“西化”与“分化”中国以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饭圈”日渐沦为布热津斯基口中的“奶嘴”,让部分青年沉迷其中,暂时满足感官、精神等享受,忘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担。总而言之,“饭圈”乱象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裹挟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叵测居心,对于“饭圈”青年而言,夹杂西方意识形态的每一次追星活动都是一次悄无声息的意识形态植入过程。

二、“饭圈”乱象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看,意识形态无一例外地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特殊的阶级性,而追星活动则往往与个体的偏好、需求等相关,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化与世俗性,似乎与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距离。然而,如果从追星活动的实现过程与其社会影响看,追星活动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评判与规制。作为追星活动产物的“饭圈文化”,尽管尚未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乃至意识形态,但却在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使部分青年在对明星艺人的拥趸中不知不觉地接受背后的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饭圈”乱象不可避免地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一系列挑战。

(一)泛娱乐风气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

“饭圈”是娱乐泛化的又一场域,适度娱乐被集体狂欢与“娱乐至死”替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7]。在宽松环境与先进技术的加持下,追星活动的娱乐性得到不断加强,让“饭圈”交往方式变得多彩、语句词汇变得多元、游戏规则变得多样、线性思维实现改变,加剧了不同观念、符号、信息之间的传递与渗透。从而,追星活动以更为便利而直观的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对部分青年的感官与心灵造成更大的刺激,引诱其“娱乐”身边的一切,使其在“娱乐至死”与“偏听偏信”中养成不健全甚至是偏离主流价值观的价值

取向与信念信仰,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当然,这并不是说“饭圈”不会讨论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内容,也不是说“饭圈”的一切活动都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而是说泛娱乐风气使主流意识形态被“饭圈”的狂欢氛围所掩盖,不利于“饭圈”青年从理性、系统而全面的视角认识主流意识形态。这也就不难理解“饭圈”为何时常出现或幼稚或偏激的爱国行为、某些明星艺人八卦新闻的热度高于某些国计民生新闻的热度、“抖音”“快手”等娱乐平台取代官方平台成为部分“饭圈”青年获取资讯、学习技能的信息源等耐人寻味的现象。

(二)狂热式追星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思想主轴,串联着人们的精神寄托与理想信念,彰显着特定而强烈的政治权威与理论权威。不过,即使凭借已有的政治保障和鲜明的政治地位,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有着被“边缘化”的风险。这一点,在相对远离政治生活的“饭圈”中更为显而易见。与一般政治团体相比,“饭圈”的政治色彩与学术意味显然更弱也更为贴近生活。明星艺人通过商品代言、参加综艺节目、拍摄影视剧等方式生产出具有商品性质的事物,“饭圈”青年则通过“打榜”“奶票”“集资”等途径为其“买单”。为巩固明星艺人的地位,“饭圈”有着明确的分工,例如有的负责文案起草、有的负责活动组织、有的负责对外公关。此外,“饭圈”也有着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几乎每个特定的“饭圈”都有权力较大的“粉头”、后援站站长等管理人员,并根据“粉丝”的贡献量大小对其进行“标签化”的等级划分。“饭圈”中,明星艺人扮演着“卡里斯玛型”角色,可以在举手投足之间对“粉丝”产生巨大影响,而“饭圈”青年则以其为中心,进行着一系列追星活动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在狂热的追星氛围中,别有用心者利用“饭圈”青年对于明星艺人的疯狂追逐,让明星艺人成为“道义”与“价值”的“至高点”,进而逐步构建出以明星艺人为“神”、以抵制不利于明星艺人发展的事物为“信条”、以“打投”“应援”等为“仪式”的近乎偏执的“饭圈文化”。由此,“饭圈”产生表象大于实质的异质性,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在部分“饭圈”青年对明星艺人的簇拥中被不断稀释。

(三)封闭型群组阻滞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性

“饭圈”多以群体性极端化的封闭型圈层示人,其群体性的活动往往使原本充满个性的追星行为受到抹杀,让人以理性与智商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并慢慢湮没于群体中。明星艺人这一“他者”是“饭圈”青年的精神信仰,尽可能地维护明星艺人的地位是其主要目标。不同于传统的追星个体与追星群体,“饭圈”的组织更为严密复杂、行动更为整齐划一。在业已成形的追星“回音室”里,有利于自身喜爱的明星艺人的声音被放大与扩散,不一样的声音则招来多方抵制与攻讦,对外部的声音也是选择性吸收。不仅如此,“饭圈”也时而宣扬明星艺人的不容易来换取更多青年的关注、同情与支持,以“受难—殉道”的叙事方式来加强其与明星艺人的联系,在“虐粉”中达到“固粉”的目的。历史与实践表明,主流意识形态不会生成于某一封闭群体中,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进行广泛而有效的交往。无论是列宁的“灌输理论”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封闭型群体在认知上的局限性。“饭圈”特有的组织架构、话语体系与“回音壁”效应,虽然让不少“饭圈”青年对其偶像的了解更为全面,使其更好地融入“饭圈”之中,但带来更多的是认知的偏差、思维的局限、判断力的丧失、情感的扭曲、主体意识的消解,令其逐步偏离主流意识形态。

(四)匿名化交流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性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部分青年不再局限于线下追星活动,互联网成为其日常活动的主阵地,“饭圈”也因此充满匿名性。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追星活动的网络匿名化使部分青年悬搁具体的社会身份。这就造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作用对象的模糊状态,使其往往只能起到一般意义的宣传作用而非精确到人的引导规制。匿名化交流也助长了“饭圈”的集体

心理,使部分“饭圈”青年的“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8],忽视法治伦理与道德规范,将自由平等变成“肆意妄为”,怀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虚拟世界中口无遮拦、横行霸道。加上“饭圈”不同“圈子”内部的高度同质性与强烈的排他性,最终造成“圈子”内部、“圈子”之间以及“饭圈”与外界的“互撕”“谩骂”等不良社交。“饭圈”的极端化倾向与网络的匿名化特质使人与人之间原本应有的“交往理性”受到淡化与搁置,让娱乐文化包装下的错误思想与不良行为在“饭圈”大肆传播,诱导不明就里、不谙世事的部分“饭圈”青年盲目跟风、唯我独尊、激起对立,以“多中心型”的匿名化极端群体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性。

(五)多维度渗透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作为当代青年亚文化之一的“饭圈文化”看似是“饭圈”独有的文化,可又不完全封闭,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说不尽道不明的联系。其一,从影响的人群看,“饭圈文化”有着向低龄化、中小学生渗透的倾向。近年来,有媒体曝光有教师在对未成年人的教学过程中引入“饭圈文化”,如某小学教师组织未成年人拍摄应援视频、某中学教师驱赶发表有辱自己“爱豆”言论的学生。可见,“饭圈”不仅对本是“粉丝”的部分教师有着影响,也可以透过日常教学将“饭圈文化”延伸至未成年人,带偏了部分未成年人的价值取向。其二,从影响的圈层看,“饭圈文化”有着向其他领域发展的倾向。一方面,“yyds”“c位”等“饭圈专用词”已被“圈外”人群日常使用。其中,也不乏带有诋毁、谩骂、侮辱等色彩的负面词汇。另一方面,“饭圈文化”也逐步从“娱乐圈”进入到“体育圈”“电竞圈”“数码圈”等诸多领域并与之产生联系。“饭圈文化”不再是文化孤岛,其内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亦可在不少圈层内有迹可循。当然,这并不是说“饭圈”乱象是其余圈层乱象的根源。因为不论是“饭圈”还是其余圈层,其在形成条件与运作模式的某些方面确实存在共通性的地方,只不过“饭圈”乱象更为突出,而这也激化并暴露了其余圈层本就存在的问题,当“饭圈”“如日中天”的时候,其余圈层也开始“闻风而动”“大展身手”,加大社会各领域的管控难度。

三、治理“饭圈”乱象的可行之径

大力整治“饭圈”乱象,廓清非理性偶像崇拜与错误思潮的价值阴霾,稳固健康有序的中国之治,是社会的广泛共识。需要指出的是,“饭圈”乱象的消弭不能寄托于明星艺人与幕后力量的良心发现,也不能寄托于“饭圈”青年全凭自我的迷途知返,更不能寄托于及时止损的“扬汤止沸”。唯有坚持未雨绸缪、标本兼治、齐抓共管、久久为功,方能还社会以风清气正、还青年以矍铄精气。

(一)坚守正确导向,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话语权

削弱与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后果,往往是社会的混乱、政权的动荡、国家的崩析。这启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坚持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才能维护与巩固好自身政权。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让人际关系变得扁平、社会思想变得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多元的思潮观念。

放眼全球,大国博弈下的文化之争充斥着道路与理论的激烈角逐,不单是技术与理念的博弈,更有话语权的博弈。“饭圈”有着“去政治化”与“去中心化”的色彩,是主流意识形态覆盖与管控较为薄弱的地方,价值观念容易向异质性发展。“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9],要充分发挥前者对后者的统领作用。针对“饭圈”日趋多元的利益诉求,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强包容;针对“饭圈”极为可观的创造潜力,主流意识形态要善于激发;针对“饭圈”好坏混杂的各类现象,主流意识形态要甄别回应。

(二)坚持人民至上,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亲和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高度重视人民,在一百多年征程中形成坚持人民至上的宝贵经验。坚持人民至上不仅要有鲜明的战略指向,也要有具体的实践举措。由“饭圈”观之,保障青年对追星活动的合理需求是满足其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面对泛娱乐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借追星之名从多方面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青年的理想信念,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没有硝烟的战争割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应当继续坚持人民至上,将主流意识形态涵盖的宏大“政治话语”与“饭圈”内在的“生活话语”有机结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亲和力和引领力。

不过,如果对主流意识形态生活化、大众化的界限与尺度把握不准,会适得其反。主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整合“饭圈文化”的合理之处来贴近青年,在持久的价值传递与价值引导中达到规训“饭圈文化”的目的,但要始终注意保持自身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不能进入“饭圈”后就被其中的不良文化与错误思潮任意肢解、随意再造,否则容易出现被敌对势力利用的窘迫境地,造成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

(三)讲好“大思政课”,扩大主流意识形态在“饭圈”的影响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教化的重要路径。新时代,授课背景、教学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对其现实性与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真正发挥其立德树人作用,就不能满足于在教学层面的机械灌输,而是要培养青年自觉的批判意识,引导其结合所处的具体环境去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拨开错误思潮的价值“迷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0]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点在“大”,既包含视野与格局之“大”,也囊括理论与实践之“大”,还表征时间与空间之“大”,更折射机遇与挑战之“大”。将思政课与“饭圈”乱象批判结合起来,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领域,是讲好“大思政课”的必然之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破解“两个大局”中思想危机的卓越智慧,讲好“大思政课”必须在各个环节将其融入进来。教育者应当主动了解“饭圈”,掌握青年的思想动态与兴趣所在,充分挖掘“饭圈文化”与二者之间互通的内容,巧妙地将“大思政课”与网络世界串联起来,不断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场域,提高二者的辐射范围与穿透力度,引导其形成理性的思维与良好的自制力,鼓励其树立远大志向,提醒其不能让“三观”随着“五官”走,自觉抵制“饭圈”的不良风气。

(四)凝聚各方力量,打造协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质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都可以带领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人们的共同目标、团结带领各方力量并肩作战。当下,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治理“饭圈”乱象的关键亦离不开优质的队伍。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打造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形成协同而行的治理态势,共同维护好主流意识形态。

首先,抓住关键少数,打造坚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干部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能否抓住这个关键少数是治理与防范“饭圈”乱象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各级党政部门要切实抓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掌握话语的主动权,对“饭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予以褒扬,对背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现象予以惩治。此外,要锤炼干部政治品格,培养其过硬本领,严惩纵容“饭圈”乱象的“保护伞”与工作落实上的“两面派”,保护和支持敢于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急先锋”。

其次,找准重要群体,发挥公众人物的引导作用。明星艺人作为“饭圈”的核心人物,其影响力可谓十分巨大。德才兼备的明星艺人会使“粉丝”“如沐春风”,而素质低劣者则会使“粉

丝”“近墨者黑”。要引导明星艺人充分认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效应,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魅惑,及时制止“饭圈”中的不良行为,担负起社会文化向好发展的责任与使命。同时,也要引导“饭圈”管理者合理合法地组织“饭圈”活动。

最后,共建清朗社会氛围,引导平台与企业切实履行社会主体责任。“饭圈”不应成为资本圈养“粉丝”、收割“韭菜”的“动物庄园”,也不应成为“粉丝”定向塑造明星艺人、上演“提线木偶”戏码的“傀儡秀场”。“饭圈”乱象的出现,提醒我们要正视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与适宜青年的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为此,要引导平台与企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履行社会主体责任,不断优化其运营模式,将重心放在创造文化精品上。

(五)增强制度供给,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高度凝练与具体呈现,具有填补道德缺位的强力效用。构建积极向上的“饭圈文化”,推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平稳发展,除了需要内在的个人修为,也离不开外部的法治保障,要大力推动“饭圈”乱象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

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饭圈”依托互联网而运作,存在匿名性、自由性等客观现实,制约着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的发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11],表明了党对网络空间治理的高度重视与坚定决心。目前,尽管已有《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等规章制度,但在工作责任落实与娱乐产业管理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树立法律意识。过去,“饭圈”中出现不少买卖明星艺人信息、造谣诽谤等违法乱纪行为,引发一系列法治问题。为此,要持续强化“饭圈”成员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意识,明确行为红线,引导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展开活动。同时,也要对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查处,以作警示。

[参 考 文 献]

- [1] 罗伯特·L.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支持与反对》,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 [4] 尼 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译注本),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45页。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页。
- [7]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 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 [8]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 [10] 《“大思政”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3月7日。
- [1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责任编辑:张 丹)